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满蒙权贵与20世纪初的政治生态研究书系

新旧之间

# 端方与清末变局

孙燕京◎主编

闫长丽◎著



卷之八 历史

非外借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旧之间：端方与清末变局 / 闫长丽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2023.2  
(满蒙权贵与 20 世纪初的政治生态研究书系 / 孙燕京主编)

ISBN 978-7-5222-0252-5

I. ①新… II. ①闫… III. ①端方 (1861—1911) — 人物研究 ②中国历史 — 研究 — 清后期 IV. ①K827=52 ②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01017 号

## 新旧之间：端方与清末变局

---

作 者 闫长丽

责任编辑 王 敏

责任印制 周 然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2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宁 欣 刘林海 安 然 张 升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 建

吴 琼 周文玖 罗新慧 郑 林

庞冠群 侯树栋 姜海军 郭家宏

耿向东 董立河

## 出版缘起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正在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在教学方面，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后，一批底蕴深厚、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如十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二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与政治研究丛书》、三卷本《清代理学史》、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二十三卷本《陈垣全集》以及《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上博简〈诗论〉研究》等巨著，这些著作皆声誉卓著，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得到同行普遍好评。

上述著作外，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又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在学科前沿。为了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我们组织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 清末政治生态与政治史研究的 几点思考（代总序）

## 大时代与好时代

20世纪，全球化特征日趋凸显。它的第一个十年，资本帝国主义以血以火以资本的形式急速膨胀，被压迫国家、被压迫民族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一些继续沉沦，一些幡然奋起，这些变化同时解构着世界。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持续的苦难，强敌逼迫，国势凋敝，当权者不得不重新选择道路。走入20世纪，国家历史进程演绎出波澜壮阔的画面。

我一直以为，晚清不是好时代却是大时代。所谓“好时代”包括“文景之治”、唐宗宋祖等千百年传颂的妖娆，无须更多申说，大时代的意义却往往不同。之于晚清，其“大”特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迫卷入世界市场，走出专制、拥抱共和，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变动之剧，罕与匹敌。久居和平环境的我们，很难体会那种翻覆与动荡。1907年，因涉嫌“康党”而避祸上海的孙宝瑄感慨：“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且屡见诸诏旨，几等口头禅，视为绝不奇异之一名词，诚数年前余等居海上时所梦想不及也。”<sup>①</sup>如果不是身处其间，很难体会短短七八年，观念、风气、时局所发生的剧变。

解构与重构是复杂多元的裂变过程。至清末，七十年变局造就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结构发生从中心滑落边缘、边缘位移中心的秩序塌陷。经由太平天国运动，中央地方的权力消长致使督抚始而“尾大不掉”继而“分庭抗礼”终则“离心离德”。经由新式教育、选拔人才方式的变化，导致旧士人失

---

<sup>①</sup> 《孙宝瑄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57页。

势、新知识分子崛起，士大夫与皇权“天然联系”的纽带断裂。经由湘淮军、新建陆军，扭转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局面，却反转为“兵为将有”的格局。至于国家财政的窳败、满汉矛盾的潜滋暗长、最高统治集团的内耗，皆导致了统治危局。如何才能“解套”？显然，想维系旧的改革思路是没有指望的。

困顿求生，预备立宪不期而遇。但对它的期许，简直是见仁见智、南辕北辙。革命派要取消君权、立宪派要限制君权、当权派要维护君权，几近各不相让。博弈的过程，就成了清末政治渐次脱离君主专制走向立宪、走向共和的过程。

实际上，清末政治走向有多种可能性。一味地论证王朝最高决策者如何走向失败不过是习惯上的后见之明。在研究中，以历史的结果预设“固定”的进程，会遮蔽历史演化本身的丰富内容和可能进程。历史学一向有解释的功能，我们想解释这些过程，想指出各种可能，想说明结局的偶然与必然。追寻怎样走偏、如何误入歧途以及违背初衷的蛛丝马迹，好似围棋高手的复盘，会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现实价值与学术意义。

人们常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行进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天命”中的“气数”又是何时“耗尽”，自我朽败又是怎样开始且逐渐加深加速的呢？

## 清末政治的研究

与清末历史同样丰富多彩的是研究的热闹非凡。就研究范式而言，革命、现代化、从西方中心到中国中心先后登场，相互砥砺；区域社会、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各领风骚，反复切磋；一些固有的热点被冷落，一些貌似不起眼的问题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学界对清末政治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例如辛亥革命，经由民国时期的

英雄谱系书写、共和国时期的革命叙述，学术层层堆垒，不仅成为高原，简直就是高山巍峨。但不可否认，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辛亥革命的研究畸轻畸重，轻易地抹去了革命之外丰富的历史侧面。彼时，清王朝统治阶级、精英阶层，甚至态度与立场略显温和的群体都被当作革命的对立面，甚少关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港台地区的学者开始把视野投向立宪派、立宪运动；八十年代后，内地研究者也陆续调整了研究视野与方法，突破了简单化、贴标签、泛革命化的框架。此后，晚清政治史至少沿着三条线索——民族民主革命的线索、政治现代化的线索、权力结构与运作的线索，在六个方面——系统化、序列化趋向；从革命史单一向度到多维视界展开、形成多元互动的态势；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大幅推进制度史研究；开拓政治文化史、心态史、权贵研究等新领域；整理出版大量的晚清史资料，为研究的提升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近三十年的晚清政治史成果显赫。即便如此，大家都觉得仍有一些待深化、需拓展的空间。

具体而言，研究对象仍可进一步细化、深挖。政治史研究与政治人物密不可分，随着史料发掘整理，对那些以往被忽视的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核心群体、满蒙权贵仍然有研究的空间；对清廷政策的调整、立宪认识与实施、解救危机的选择仍然有推敲的余地。甚至，清末新政取自民间的巨额经费，到底给下层人民多大的压力？百姓的“税负痛苦指数”究竟如何？是否可以进一步追索与解释？其实，自2012清帝退位百年之时，不少学者已经把视野转向了清廷权贵，试图更合理地解释鼎革之际“原体制内”的变化以及内部的自我侵蚀与消融。

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他的客观事实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我觉得，我们并没有穷尽晚清、清末的话题（可能永远不能穷尽），很多真相还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很长时间以来，谈及20世纪初十年这一段历史，人们多把它看作辛亥革命的准备、发动、成功与失败的完整链条，言外之意，楼都塌了，分析楼的主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还有什么意义？其实，回到历史本身，辛亥革命只是清末十年的一部分，换一句话，清末历史的多元内容远远不是一场革命所能涵盖的。

## 政治史是历史研究的脊梁

异彩纷呈的历史由人类写就。很多年里，不少研究者欣喜于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欣喜于“宏大叙事”、治乱兴衰之外的丰富故事，致使政治史一定程度被“轻慢”。<sup>①</sup>但是，当我们能够回望人类社会进程时，琐碎的边边角角毕竟是海滩上的沙砾。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还是家国大事。所以白寿彝先生才感慨“政治是历史的脊梁”。

制度、人物、治乱兴衰是政治史最基本的观察点。我们立足于这一基本认知而关注清末政治大环境，也就是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关于政治生态，时人早有涉及。1900年，孙中山在致港督卜力书信函中指出，“朝廷要务，决于满臣，紊政弄权，惟以贵选，是谓任私人。文武两途，专以贿进，能员循吏，转在下僚，是谓屈俊杰”。他把矛头指向了朝廷，也就是满蒙权贵把持的国家政权，认为他们是导致清末政治生态失衡的“罪魁祸首”。此后，研究者多承袭革命党人的申说，对清末的政治生态一言以蔽之“腐败”。那么，当权者是否知其“腐败”？是否任其发展而不想办法、不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是否全不对症、全然无效？是措施不对还是“运命”不好？换句话说，是否清廷没有一点机会、一点“历史的余地”？在我看来，至少宣统之初，少壮亲贵是有信心的。胡思敬说：“载沣初摄政时，兴致甚高，凡批答各省章奏，变‘依议’曰‘允行’，如史臣记事之体，折尾恭誉套语辄加浓圈。后亦稍稍懈弛，视德宗时尤甚，虽交议交查密旨，或累月经年不复，亦若忘之，无过问者。”<sup>②</sup>先是积极进取，继而懈怠疲玩，很快就书写了清末政治的一个“常态”，为什么？这与人们惯习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政治大转型时代，彼时存在着险中求胜的可能性。本着这一认知，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重新探讨当时的政治生态，

① 参见拙文《“内轻外重”抑或“内外皆轻”？——评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兼论晚清政治史研究》，载于《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② 胡思敬：《军机不胜撰拟之任》，《国闻备乘》卷四，上海书店1997年版，第94页。

分析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塑造政治生态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围绕满蒙权贵着手展开 20 世纪初十年的政治生态研究，策划了“满蒙权贵与 20 世纪初的政治生态研究”这一书系。从选题火花到逐渐清晰再到杀青历时十余年（每一种著作出版时间各不相同）。作为书系的主编，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就特别关注晚清政治史及权贵群体。<sup>①</sup> 其后，有感于晚清政治史研究远没有穷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甚至还需要“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心怀这个梦想，我在指导硕博学位论文时，开启了“十年大计”。我们打算从史实出发，力图还原历史的本真面貌，研究当时的权贵集团与政治生态。我们所说的“权贵”，是指统治集团中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群体；而满蒙权贵则专指清朝统治阶层位于权力核心的满蒙王公贵族、旗籍高官及封疆大吏；有时候范围更小一些，指的是皇族近亲，大凡取这个意思时就称之为“亲贵”。清末，由于政治权力构成的复杂性，权贵群体很难完全排除统治阶级中的汉族高官，故兼及之。研究的重点是清末政治生态的样态、成因、流变；执政的满蒙权贵的政治认同及其变化；对改革的认知、决策、争论以及政改取向；满蒙权贵对宪政理解；改革实施等关键环节，阐发体制内改革的因应及成败得失。

那么，什么样的生态造就了清末的制度变革、人物遭际以及房倒屋塌呢？

## 书系的构成

我们试图在全球观照下，讨论清王朝最后十年的外部逼迫与内部矛盾、政策调整、改革举措，特别是聚焦于满蒙权贵的际遇、因应、行事风格、所思所想。试图推演清末政治生态以及“危机”对改革成败的影响。

书系包括九种专著，分别是：

<sup>①</sup>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地方督抚与晚清政局》，于 1984 年完成答辩，此后心猿意马，直到三十年后才再次回到这一领域，真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

朱文哲：《王朝与国家：清末满洲贵族的政治认同》

周增光：《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

杨猛：《最后的家天下：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

梁山：《清末政治与中日关系》

周福振、庞博：《“铁帽子王”善耆与时代变局》

闫长丽：《新旧之间：端方与清末变局》

连振斌：《锡良与清末新政》

朱淑君：《赵尔巽与清末制度变革》

何思源、程学峰：《新政、新制、新文化：编订名词馆与贵胄学堂》

这些研究包含以满蒙权贵集团各个群体为视角的综合考察，以执掌中央职能部门的显赫亲王以及执政一方的满蒙督抚为中心的个案研究，还包括清末若干新设机构的个案研究。

在我们看来，清末新政乃至预备立宪既是形势所迫，也是自主选择。满蒙权贵先是颞预不足道，后是走向世界并认识了权力的变通方式（用立宪代替专制）。尽管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处心积虑地维护着皇权，但毕竟不知不觉地拥抱了现代制度文明。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揭示的大革命萌生于旧制度所说的那样。即使王朝覆灭以后，清末新政以及立宪的一些措施依旧延续下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或者一项制度性奠基。大如现代政治的形成、政治结构日趋专门化、政治职能的扩大和完善、政治组织趋于制度化、国家治理的法制化走向、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赋予、人民权利的宪法表达、现代生活观念的生成等，小如街道门牌的编制、衣食住行的变化，追根溯源，无不聚焦在那个时代。因之，考察它的过程、分析它的利弊得失、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就具有了鉴往知来的意义。

我老是耽误自己。其实早些动手可以更从容地思考。但终日奔竞于日常琐事，每一次都是到交稿“大限”所剩无几才仓皇上阵，于是曾经的思考化为“大脑空白”，只好临时起意，匆匆了事。谨以为序。

孙燕京于朝阳袖手斋

丁酉腊月

# 目 录

1	绪 论
16	第一章 端方与大时代
16	第一节 甲午战后的中国社会
19	第二节 满人才子
21	第三节 戊戌维新的“得益者”
27	第四节 襄赞立宪的封疆大吏
38	第五节 葬身革命
44	小 结
46	第二章 端方与政治变革
46	第一节 明臣与能吏
57	第二节 军事改革实践
69	第三节 支持预备立宪
83	小 结
86	第三章 端方与实业创新
86	第一节 广兴实业、振兴工商
97	第二节 “路经官办，利权在我”——筹建现代交通
105	第三节 端方与南洋劝业会
121	小 结

123	第四章	端方与教育变革
123	第一节	“兴学以启民智”——倡新式教育
129	第二节	“教育系侨情”——开拓华侨教育
132	第三节	广游学，收“百闻不如一见”之利
140	第四节	兴女子教育
146	小 结	
147	余 论	
154	结 论	
158	附录一	端方生平大事记
160	附录二	《端方档案》述略
164	附录三	端方传记
167	附录四	《端忠敏公奏稿》目录
187	参考文献	
201	后 记	

## 绪 论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亦作“陶斋”),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与那桐、荣庆被时人并称为“北京旗下三才子”。<sup>①</sup>端方自幼被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子,桂清是同治帝的老师,并曾先后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和内务府大臣,故年少时期的端方便生活在满族权贵之家。光绪五年(1879),端方的养父桂清去世后,端方以荫生资格保捐,被分至工部,于满洲候补员外上学习行走。光绪八年(1882),端方中举,时年二十一岁,“入员外郎”,<sup>②</sup>准备在仕途上大展宏图。然而事与愿违,因生父母相继去世,端方丁忧在家。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他方才受命筹办光绪帝婚事,因办事干练,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赏识褒奖,加四品衔,就职于工部。之后的十年中,端方的仕途较为顺利,先后任职张家口关税监督、工部郎中、直隶霸昌道等。但戊戌变法之前他所办事务多为皇宫内廷事务,对宫廷之外的事务接触较少。因职务与个人际遇所囿,百日维新之前,端方大多数时间在为个人的仕途打拼,尚未对时局和西学提出明确的主张。

端方在清末<sup>③</sup>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始于百日维新,他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虽仅任职短短一月,却尽职尽责,屡上奏折筹办总局事务,主张农工商三者协调发展,是戊戌维新的积极支持者。戊戌政变后端方被革职,因“巧于仕宦”并进呈歌功颂德的《劝善歌》,旋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后历任陕西巡抚、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湖南巡抚等职,积极推行新政,

①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附录《那桐亲书履历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079页;刘垣:《张謇传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2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34—135页。

② 赵尔巽:《端方传》,《清史稿》卷469,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87页。

③ 本文所言“清末”时限约为1890—1911年。

致力于任职省份的政治、经济、教育改革，推动了地方现代化的进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端方作为清廷委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赴欧美十四国、历时七个多月考察各国政治。端方首次迈出国门，亲受欧风美雨的洗礼，长期禁锢的头脑为之开化，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盛赞欧美之政治文化。回国后，端方即四处为立宪运动奔走呼号，倡导推行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二年（1906），端方赴任两江总督，继续在地方推行各项新政举措。宣统元年（1909），因其任内两江政绩突出、“考察优评”，“蒙恩擢授”直隶总督。之后，端方在筹办慈禧“梓宫移葬山陵”之事时，以“大不敬”之罪名被罢免。然而，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将其推到风口浪尖，清廷委任端方为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赴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端方却因部下哗变，客死他乡。

端方一生历仕南北，在清末政坛显赫一时，是清末满族权贵中较有才干的封疆大吏，其任职地方大员时所致力各项实践活动，推动了清末的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风俗改革。此外，作为清末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端方在中国宪政史和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书试图将端方放入清末多维的社会网络体系中进行审视评价，不仅可以纵览其一生，而且可以透过他窥见清末风起云涌的政坛；同时通过端方所致力诸如抨击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举办商品博览会等改革实践活动，来透视其思想文化及心态的变化过程，从而展示风云变幻的清末时期满族权贵的心态变化，进而探讨清末满族群体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对端方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社会史研究逐渐兴起，涌现出大量研究论著，而学界对清末政治的关注则有所减少，对清末统治阶级的研究也相对薄弱。就清末封疆大吏、朝廷要员的研究而言，学界对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实力派的研究有所偏重，而对于清末时期有作为的满族权贵、王公大臣的研究总体上相对滞后。风雨飘摇的清末时期，虽然曾经叱咤风云的满族人已日暮西山，渐失强权，但仍占据着清廷要员的半壁江山。而学界多倾向于关注汉族官员的救世济民之道，较少关注满族官员应对急剧变幻局势的救亡图存之策。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于清末满族上层社会的

研究，改变历史研究中不平衡的状况。

其二，学界对于端方的研究仍较为薄弱，与同时代地方大员的研究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领域乏人问津，研究空间仍需进一步拓展。故此，本文以端方为中心，对清末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多维度了解端方的政治生涯、文化思想及社会关系，从而为研究满族上层社会开拓一定的空间，同时兼及端方与清末宫廷关系的研究，期望为清末满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其三，端方作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远赴欧美各国，亲身体验西方国家的政土风情，西学对他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及心理影响。本书力图关注端方乃至满族权贵在清末社会变迁中心态的变化，分析清末时期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变化对此群体情感及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影响。此外，作为近代颇为著名的收藏家，端方不遗余力地收藏金石书画，刊行多种收藏目录，对近代文化传承贡献颇大，推动了近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本文尝试对端方进行系统而深入细致的研究，期望为中国近代人物研究献绵薄之力。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20世纪以来，学界对端方并未予以充分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端方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端方幕府是清末时期幕主为满族人的较重要幕府。因端方“敬礼文士”，延揽了众多幕宾。端方的幕僚劳乃宣曾对其赞赏不已：“昼则接宾客，见僚属；夕则治文书。其治事也，幕僚数人执案牍以次进，旋阅旋判，有疑义随考核加咨取焉。谋虑即得，当机立断，未尝见其有所濡滞，亦未闻其事之有遗误也。”<sup>①</sup>邵镜人亦认为端方办事机敏老练，“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sup>②</sup>端方一生仕途中的辉煌时期是出任地方督抚，推行各项革新措施。对此，严复称其为“近时之贤督抚”。<sup>③</sup>赵尔巽在《清史稿》中称赞其“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指毕沅、阮元）云”。“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

① 劳乃宣：《端忠敏公奏稿序》，《端忠敏公奏稿》卷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页。以下引文凡出自《端忠敏公奏稿》，皆省略出版信息。

② 邵镜人：《同光风云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5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03页。

③ 《与夫人朱明丽书·四》，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36页。

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sup>①</sup>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将端方视为支持维新的“志士”，称其“新授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今销衔撤差，后以他故，复升任陕西按察使”。<sup>②</sup>与此同时，郑孝胥曾评论清末时人“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但曾与端方任职于同城的张之洞对其则颇有些许微词。张之洞指出：“至谓端有学有术，则未免阿其所好，学问之道无穷，谈何容易，彼不过搜罗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谬附风雅，此乌足于言学耶？”<sup>③</sup>费行简也认为，端方“佻薄奸险，以新政涂饰朝野而已，乘间取贿，所藏金石书画值三百万”。<sup>④</sup>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学人对端方的关注，多为时人的评价，尚不属于严格的学术研究。民国时期，学人对端方鲜有研究与评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端方的研究仍十分薄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研究端方的论著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通论研究、改革实践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关系研究等。

关于端方的通论研究。张海林教授的《端方与清末新政》<sup>⑤</sup>一书是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考察了端方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改革实践活动，从“初任方面大员”“署理苏抚”“实任湘抚”，至“出任两江总督”，最终“客死资州”，全面展示了端方“绚丽而悲壮”的一生。论著评述了端方出任两江总督时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事业上的建树，着重阐述他在清末新政时期锐意革新的改革实践，而对其文化思想、心态、与同时代人物的对比以及人脉关系的关注相对较少。如在“出洋考察宪政”一章，作者更多地着眼于叙述端方考察途中的所见所闻，而对西学对久处闭塞之境的满族权贵思想的影响论述相对较少。张海林认为端方“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论者。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推崇一点也不比当时的资产阶级人物来得逊色”，并称赞其“是一个带有中庸精神

① 赵尔巽：《端方传》，《清史稿》卷469，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87—12788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54页。

③ 刘禹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8页。

④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07页。

⑤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